

乌隘寻踪

赵晨沙



乌隘大屋



乌隘大屋外景

乌隘，属江北区甬江街道压赛村，坐落于环城北路东段一侧，以乌姓族人始居故名。隘，普通话读“ài”，用于地名，意为狭窄、险要的道路；宁波话读“gā”，是地名特色用词，地区文化意味深长。

追溯宁波乌姓的来源，据现存于天一阁的民国《迁鄞乌氏盛房支谱》记载：“始祖觉省公始迁以来世居镇海县西管乡。”西管旧属镇海县，宁波的乌姓始祖觉省公及后世聚居于此。又据日本学者本田治《明代宁波

沿海地方的开发和移民》一文考证：“乌姓先世河南颍川望族，明末清初有兄弟逃荒来此，以烧窑为业，建成村落。”颍川，古郡名，为历史上除京师之外的大郡。治所在今河南禹州，黄帝生于此，夏禹建都于此，是中国众多姓氏的发祥地。

大约在清乾隆年间，宁波乌姓自乌隘迁鄞。乌姓聚居地原分东乌和西乌，各有祠堂一座。东乌，即今乌隘自然村；西乌，即今西管附近，于1951年扩建庄桥飞机场时废。

临近村口，只见乌隘河由北往南穿村而过，周围民居沿河而建。在一棵大树底下，一座古桥横卧两岸，这就是村民所说的乌隘桥。该桥是一座单孔平板桥，于咸丰二年（1852）重修。桥两侧为青石栏板，长2.6米、宽0.47米、厚0.18米。桥两端均施望柱，望柱呈长方形。栏板外侧中间横书“乌隘桥”三字，一边直书“咸丰壬子秋日”六字，另一边直书“乌姓重修”四字。桥旁商铺林立，人来人往，为整个村落的活动中心。岸边至今残留几个硕大的石构件，供农闲之余村民在此驻足歇息。整座桥透着岁月斑驳青幽的色彩，成为该村历史兴替见证。

深入村内，乌隘134号民居是一处典型的清代江南风格四合院。院落布局规正、做工考究，保存基本完整。主体建筑坐北朝南，现存建筑由倒厅、正厅、两厢及东西偏房组成，占地面积约1813平方米。由于规模巨大、气势宏伟，当地人称乌隘大屋。整座建筑前进为硬山顶，五间二弄，东侧一弄置大门，北置廊，明间倒厅采用中柱落地，前后双步，穿斗抬梁混合结构，隔墙采用小磨砖砌筑；后进为重檐硬山顶楼房，前置廊，面阔五间二弄，明间正厅为穿斗梁架，进深八柱九檩，后加一双梁。

据村中90岁老人乌国华回忆，乌隘大屋

为清晚期一乌氏族人所建（“显”字辈，佚名）。相传他早年为考取功名，埋头寒窗苦读。因为禀性聪慧、才思敏锐，很受清廷礼部侍郎、浙江学政胡瑞兰的赏识，于是收其为门生。胡瑞兰，同治、光绪两朝轰动一时的“杨乃武与小白菜案”的复审官员。能拜于胡瑞兰门下，可见他的出众之处。该乌氏族人在金榜题名、衣锦还乡之时，修造乌隘大屋，以光耀门庭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大屋南边正门还悬挂有胡瑞兰题写的匾额一块，门前左右两侧各立有旗杆石一座。民国时期，大屋的产权为乌氏“传”字辈芸芬、芷芬、芨芬、瑞芬、维芬、有芬六兄弟共有，其中芸芬、芷芬分得房屋东首，另四兄弟分得房屋西首。后来，乌芸芬离开宁波前往上海经商，长期在沪定居。

乌隘大屋后边紧贴墙有一方池塘。池边竖一石碑，碑文如下：“禁止池内洗澡濯足及放牧鹅鸭，洗浣衣服被褥污秽物件，如敢故违，从重议罚，决不情宥口（此字不清）。此谕知。光绪甲午夏，恩议堂主人敬。”这方池塘分明是作为饮用水源而开凿使用的，为保水源清洁，立下了村规民约，在当时实为族规。从池塘一侧条石痕迹看，水池与乌隘河曾相通。现今，这条“为有源头活水来”的通道已变成机耕路。

跨过乌隘桥，是一条蜿蜒绵长的小巷。两边是低矮的旧式民居，旁有多条小弄横穿其间。小巷尽头是一马平川，在田野与民居交界处有一块空地，新建了乌隘凉亭。原亭早已损毁，只留下一根长形石柱，一头凿有卯榫凹槽，分明是用来嵌入横档木梁的，静静躺在附近一座老屋的篱下，任风雨侵蚀。昔日，正是乌隘的凉亭、石桥、大屋营造了江南河网地带小村古雅的风情；而今，这种风味已渐行渐远。

“慈谿”与“慈溪”

童银舫

由教育部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的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业已公布，据称，这是历时10余年、先后修改90余稿的结果，共收字8105个，分为三级，一、二级为常用字6500个，三级为满足信息化时代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的用字1605个，为姓氏人名、地名、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，其中编号为7959的是“谿”字。有人开玩笑说，既然“谿”字已转正，那么作为地名，“慈溪”现在应写作“慈谿”了。

而作为县名的“慈谿”二字，还是有来头的，文雅的说法，是有典的。

其实“慈谿”最早也最标准的写法，应该是“慈溪”。慈溪设县，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（738）。《旧唐书》卷四十·地理三记载：“开元二十六年，于越州鄮县置明州。”“奉化、慈溪、翁山，已上三县，皆鄮县地。开元二十六年析置。”《元和郡县志》也有记载：“开元二十六年，采访使齐澣奏置慈溪县。”至于为何取名“慈溪”，董孝子母慈子孝的故事现已家喻户晓。延祐《四明志》卷四·人物考云：“董黯，会稽句章人。母尝寝疾，喜饮大隐溪水，不以时得，于是筑室溪傍，以便日汲，厥疾用瘳。溪在今县南一舍，故以慈名溪，又以溪名县。”因此，慈溪又有“慈水”、“孝水”、“溪上”等别称。慈溪第一任县令为房琯，河南人，与杜

甫为知友，《旧唐书·房琯传》称其“历慈溪、宋城、济源县令，所在为政，多兴利除害，缮理廨宇，颇著能名”，后出任唐玄宗、肃宗两朝宰相。

到了明朝永乐十六年（1418），慈溪县印丢失，只得改溪为谿。《明史》卷四十四·地理五记载：“慈谿，元曰慈溪。永乐十六年，改溪为谿。”明天启《慈溪县志》卷一更有较详记载：“永乐十六年，令有失印者，请于朝，诏更铸。恐失印复出，致滋奸利，故更印文从谷，而名慈谿（其失之故，或云失于水，或云盗，今不可考）。”至于丢失县印的县官是谁？历代县志并无确切的记录。

从此以后，作为地名，“慈溪”就写作“慈谿”了，一直用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。

那么，究竟是什么时候将“慈谿”恢复成“慈溪”的呢？普遍的说法是，1956年国务院公布《汉字简化方案》后，“谿”字简化成了“溪”。1986年和1992年出版的《慈溪县地名志》和《慈溪县志》也持此说。但我仔细查阅了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公布的《汉字简化方案》，竟然没有找到。而“谿”仍用为正字广泛使用，如勃谿、谿壑、谿卡、谿刻。当然，作为“溪流”意义时，“谿”可写作“溪”，这是古已有之的。但1955年12月由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

联合发布的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中，已将“谿”作为“溪”的异体字，从1956年2月1日起停止使用。所以，准确地说，慈谿的“谿”字是作为异体字废止的，而不是作为繁体字被简化掉的，如今的转正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因为本次转正的，没有一个繁体字。

我查了一下慈溪市档案馆馆藏的文件，在县委文件中，1956年1月写作“慈谿”，2月以后作“慈溪”，但县委公章却迟至1965年初才改刻为“慈溪”。

那么作为地名，“慈谿”只适用于明永乐十六年至公元1956年（前后共538年），而“慈溪”则亦古亦新，古，是指唐开元二十六年至记明永乐十六年这680年；新，是指上世纪50年代县境调整以后——1954年，慈谿、余姚、镇海三县县境进行调整，慈谿县变化最大，县治也从慈城迁到浒山，仅保留观城和鸣鹤二区。可以说，老慈谿与新慈溪作为地域概念，几乎完全不同了。1988年，慈溪撤县设市。

我在工作中，常常听老慈谿人抱怨，说自己祖辈都是慈谿人，现在划属他县，籍贯上的尴尬，似乎成为爹不亲娘不爱的弃儿，乡关何处？迷惘失落，竟成了人生一个心结。

所以，“慈谿”与“慈溪”有别，更不能随便地将“慈谿”简化成“慈溪”。

一定是把你当作了前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。我想来想去，你唯一的办法，是留下一份写给读者的声明，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，然后离开。离开上海，离开中国，而且要快。否则众口铄金，真会被他们灭了。”

“不，战士宁死不屈！”这是齐华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他曾经是个军人。他看着我说：“所有的诽谤都刊发在媒体上，而我国所有的媒体又都是官办的。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厅局级了，现在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是你当时的直接上司和同事，而且我听说他们都是你的读者。如果拨打一个电话给他们任何一位的秘书……”

我立即按住了他的手背，说：“如果我拨了这样的电话，十多年前的辞职就失败了一半。与其求救，宁肯逃走。”

齐华伸起手来想反驳我，但他伸起来的手停在半空了。停了几秒钟，这只手伸出了大拇指，朝我颤了颤。

“但是——”他又迟疑了：“能不能，不离开中国？”

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，说：“灾难是我的宿命，我不离开中国。”

“那就必须离开上海！”杨长勋说：“我统计了，这些年诽谤你的文章，发表最多的是广州、长沙、天津、香港，但发起者全在上海。你只要在上海一天，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静不下来。”

“我离开上海的决心早就定了。当年评审中文学科和艺术学科教授时被我否决的各单位人员，好像全都串连起来了，怪事接连不断。最让我难过的是，那台黄梅戏《红

后所城

张伟

与其说后所城是一个古朴的山村，不如把它叫作一座山城，因为它耸立在穿山半岛逶迤的山岭之上。

俗话说人云亦云，叫了那么多年，只是习惯罢了，顺口而已，而多年后，偶尔翻阅史料，才知道，这曾经伴随我年少岁月的村子，竟然是明代卫所驻守之地，一座古边城。

在我印象里，戍边多为塞外苦寒之地，漫天的飞雪，肆虐的黄沙，一群神色肃穆的士兵，盔甲鲜明，刀戟林立，背后是嘶鸣的战马，“行人刁斗风沙暗，公主琵琶幽怨多”，这是李颀诉说的边外风情，而“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”，范仲淹的《渔家傲》，声犹在耳。

而随之造船技术的发达，海上贸易的互通，边防的含义不仅涵盖了陆地疆域，千里海防也随之提升至战略层面上。

曾经浏览过台州临海的海上长城，依山而建，面海而防，逶迤曲折，雄险壮观，堪称海防要塞的典范，而此前在浙东沿海，明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命大将汤和濒海筑城，以防倭寇，调定海卫后千户所驻守，故名后所。

纯粹以地理角度而言，后所城是通往白峰郭巨的必经之地，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，陡峭的北门岭以雄险著称，高大的土城墙，深沟坚壁，而村中心也有别于其他村子，起了个响亮的名字——城门头……

多年之前，我就是生活在城门头里的众多孩子的一个，而那些儿时的伙伴，特别是项姓一族，也应该是所军之后了。

如果是夏夜，我们会俯身护城河茂密的水草上捉蜻蜓，在土城墙的草丛中捕萤火虫，也有胆大些的，爬上土墙上郁郁苍苍的柏树上充当一会儿瞭望的哨兵，有时也会问大人，为什么城墙上都是密密的柏树呢，而答案往往是含糊的，毕竟古柏的来历在历经久远之后，已鲜为人知，而以它象征的正气和不朽，且把它作为对戍边者的尊重和敬仰吧。

后所城留下的资料很少，在整个东南沿海抗倭史上没有浓妆重彩的篇章，百里之遥的慈溪龙山所雁门岭大捷与其无缘，而隔海相望的岑港之战惨胜，又显得那么遥不可及。也许它只是千里海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隘口罢了，但它犹如一枚钉子牢牢楔在穿山半岛的咽喉要道上，在这里曾经雪亮的倭刀黯然失色，蜂拥而至的倭寇踟蹰不前，在这里江南柔弱的民风瞬间变得强悍凛冽，当郭巨总台山上的烽火狼烟四起时，梅山岛上的村民已鸣鼓而起，全民皆兵，而所城的守军也已整装肃发，衔枚急行。

远去了城墙上戍边的身影，远去了城门头军营里摇曳的烛影，在历史的长河里，这一切都已幻化成温润的水滴，戚继光脱口而吟的“封侯非我愿，但求海波平”也是一代所军心中遥远的梦想吧。

曾几何时，雄关漫道已化通途，随着羊白岭隧道的开通、泰山路的延伸，交通之利的后所城已悄然隐退，如同一位白发将军卸下满身征尘，安然隐于山野。如今漫步所城，看云淡风轻，看飞鸟在鸣，扑面而来的是无边的安详宁静，我想这也是当年所军们的终极心愿吧。



70

杨长勋说到这里作了一个总结：“近几年来，整个中国文化界，只要有人提到文革余孽、文化杀手、文化口红这三个称呼，一定是指你，没有第二人选。”

“说完了？”我问。

“这些脏话从我嘴里说出来让你听到，我已经造孽！”杨长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，几个杯子都抖了一抖。我看他前面介绍情况时口气还比较平静，没想到他压着一肚子气。

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，让他平静一点。他喝了了一口，我和齐华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，茶已经凉了。窗外还在下雨。

齐华开口了：“不能再这么下去。想想看，该怎么办？”

杨长勋说：“这就是我这次赶到上海来的目的。我静静地看了几年，觉得形势对你非常不好。所有的媒体都知道，攻击你这个大名人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发行量，又不会承担政治风险，因此越闹越刺激。谁为你辩解，谁就跟着挨骂。更奇怪的是那个向你开第一炮的余家学生，现在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，受到美国政府重视。美国人粗心，

一定是把你当作了前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。我想来想去，你唯一的办法，是留下一份写给读者的声明，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，然后离开。离开上海，离开中国，而且要快。否则众口铄金，真会被他们灭了。”

“不，战士宁死不屈！”这是齐华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他曾经是个军人。他看着我说：“所有的诽谤都刊发在媒体上，而我国所有的媒体又都是官办的。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厅局级了，现在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是你当时的直接上司和同事，而且我听说他们都是你的读者。如果拨打一个电话给他们任何一位的秘书……”

我立即按住了他的手背，说：“如果我拨了这样的电话，十多年前的辞职就失败了一半。与其求救，宁肯逃走。”

齐华伸起手来想反驳我，但他伸起来的手停在半空了。停了几秒钟，这只手伸出了大拇指，朝我颤了颤。

“但是——”他又迟疑了：“能不能，不离开中国？”

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，说：“灾难是我的宿命，我不离开中国。”

“那就必须离开上海！”杨长勋说：“我统计了，这些年诽谤你的文章，发表最多的是广州、长沙、天津、香港，但发起者全在上海。你只要在上海一天，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静不下来。”

“我离开上海的决心早就定了。当年评审中文学科和艺术学科教授时被我否决的各单位人员，好像全都串连起来了，怪事接连不断。最让我难过的是，那台黄梅戏《红

楼梦》在海内外一路轰动，一到上海立即被围杀。几个文化人先挑唆戏曲界几个老人无理取闹，又欺骗北京一位在重要人物身边工作的女士介入，这台戏只能停演，偌大的上海一片幸灾乐祸。当时我就要走。”我说。

至于留下一份给读者的声明，我请他们明天下午再在这里聚会讨论，我连夜写一个初稿。

外面雨已经停了，图书馆走廊两边的树木还在滴水。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来的，一切都很熟悉，只是觉得变小了。已是傍晚时分，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。突然，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，停下，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，说：“余先生，有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，我向你道歉。”

“什么文章？”我问。

“说有一些特殊的女性在读你的书。”她声音很低，快速说完，转身就走了。

她相当俏丽，很有风韵，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了。我们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，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。

“文章又不是她写的，她为什么要道歉？”我问。

“有三种可能。”杨长勋说：“第一种可能，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；第二种可能，她只是你的读者，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，因此要道歉；至于第三种可能，就不好说了……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